

作为幻象的美德:情境主义的基本观点及证据*

赵永刚¹, 胡祎赞²

(1. 吉首大学 哲学研究所, 湖南 吉首 416000; 2.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36)

摘要:情境主义者依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 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美德伦理学中美德概念的实在性。多里斯只否定了较强意义上的美德概念的实在性, 而哈曼还否定了较弱意义上的美德概念的实在性。他们的主要证据来自心理学实验的研究结果。

关键词:情境主义; 美德; 哈曼; 多里斯; 心理学实验

中图分类号: B82-0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3-0039-06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0YJC720066); 吉首大学引进人员资助项目(jsdxkyzz201002)

作者简介: 赵永刚(1978-), 男, 湖北江陵人, 博士, 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讲师。

胡祎赞(1978-), 男, 甘肃天水人, 博士, 杭州师范大学讲师。

情境主义(situationism)是社会心理学中的一种传统, 它利用经验性的实验方法来研究各种特殊情境中人的行为模式, 探究影响行为的因素。其基本主张是, 人们的行为主要归因于外部情境而不是人的内在特征。情境主义传统最早始于上世纪 20 年代, 但它在很长时间内都并没有渗透到道德哲学领域中来。^{[1](P116)} 上世纪 90 年代初, 心理学家开始有意识地用经验的方法考察道德人格问题, 但这种工作没有立刻在伦理学领域产生广泛的影响。^{[2](P603)} 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 一些具有社会心理学知识背景的道德哲学家才开始将情境主义的研究成果引入到伦理学中, 对伦理学中的“美德”概念的实在性提出质疑, 从而引发了西方伦理学界广泛的讨论。

从现有的文本来看, 最先将情境主义观点引入到伦理学中的是约翰·多里斯(John Doris)和吉尔伯特·哈曼(Gilbert Harman)。多里斯于 1998 年在《奴斯》(Nou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人、情境与美德伦理学》(Persons, Situations, and Virtue Ethics)的文章, 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概念进行了

心理学的解读, 用情境主义的经验证据否定了美德概念的实在性。在此基础上, 他在 2002 年出版了《品格的缺失: 人格与道德行为》(Lack of Character: Personality and Moral Behavior)一书, 更详尽地阐释、论证了他的观点。哈曼在 1999 年发表了《道德哲学遇上社会心理学: 美德伦理学与基本归因错误》(Moral Philosophy Meets Social Psychology: Virtue Ethics and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一文, 论证美德伦理学的美德概念不过是一种“幻象”。

一、温和的情境主义观点

多里斯在《人、情境与美德伦理学》中试图表明,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道德心理学是存在问题的。他认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伦理学方法预设了某种描述心理学, 而这一预设可能遭受经验的批评。多里斯首先指出了我们的日常道德观点: 我们相信具有良好品格的人不会轻易受到情境的影响, 对这样的人我们往往用“坚定”、“值得信赖”等评价性的语

* 收稿日期: 2011-04-20

言来形容;相反,对于道德行为令人失望的人,我们往往会认为他们缺乏道德品格,认为他们是“意志薄弱的”、“反复无常的”、“不值得信赖的”。^{[3](P505)}显然,在这种日常道德观点中,品格意味着有规律的、惯常的行为表现,我们相信具有良好道德品格的人即使在相当不利的情境下也会做出道德的行为,而品格不端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值得信赖。这种解释假设了我们可以通过品格特征来预测新情境下的个体行为,或者说,关于人的品格的陈述是一种综合陈述。然而不幸的是,“具有近 70 年历史的社会和人格心理学的经验传统”反复向我们证明,在对行为的系统观察中没有发现这种行为上的可靠性。^{[3](P504)}经验证据所表明的是,我们不能根据这些特征来预测新情境下行动者的行为,不同的行为似乎是情境变化而不是个体倾向所导致的,“直白地说,人们通常是不具有品格的”。^{[3](P506)}

多里斯从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找到了许多关于品格的描述,在亚氏看来,品格是“稳固而不可改变的”;美德是品格(hexis),品格是一种“持久而很难改变的”倾向;美德被假设为具有可靠的、值得信赖的行为表现,具有美德的人即使遭受了可能阻止其践行美德的不幸,他仍然不会行恶。而且亚里士多德还强调在艰难和严苛的情境中履行正确的行为尤其能够体现美德,具有实践智慧的明智之人在任何情境中都能做出适当的行为。^{[3](P506)}多里斯指出,亚里士多德的这些论点也表现在当代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道德心理学中,后者在此基础上主张有德之人在“各个不同的和新的情境中”的行为将是“连贯的和可预测的”。^{[3](P506)}多里斯进一步指出,亚里士多德主义还持有“评价的一致性”(evaluative consistency)论点,即在一个既定的人格中,具有肯定性(或否定性)评价的特征与其他具肯定性(或否定性)评价的特征在发生概率上是相关的。比如,我们通常预料一个慷慨的人很可能是富有同情心的而不是冷酷无情的。因此,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而言,品格是一个将各种相关特征整合在一起的整体。^{[3](P506)}多里斯在 2002 年的著作中进一步将美德伦理学中美德的基本性质概括如下:(1)连贯性:在与某一品格特征相关的各种不同的情境中,行动者与这一品格特征相关的行为可以可

靠地展现这一品格与人格特征;(2)稳定性:在与某一品格特征相关的反复出现的相同情境中,行动者与这一特征相关的行为都能可靠地展现这一品格或人格特征;(3)评价的整体性:在一个给定的品格或人格中,具有特定评价性质的某个特征的出现与具有相同评价性质的其他特征的出现或然相关。^{[4](P22)}

多里斯分析,如果要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这种品格特征找到证据,我们就必须要观察到行为的可靠性,即在一系列相关而又不同的情境中与某一特征或一系列特征相一致的行为。用心理学的话语来说,将行为归因于品格特征要求行为必须具有跨情境的连贯性(cross-situational consistency)^①。但多里斯认为他所了解的实验数据表明,跨情境的连贯性是不存在的,人们行为的可靠性通常非常小。比如说,你在和办公室的同事聚会饮酒时表现得很节制,但在家庭聚会时则可能不节制。人们的各种品格只存在于非常具体的相同情境中,一旦情境发生变化,即使是非常微小的变化,人们的行为模式就会发生变化,因而相关的品格便不存在了,因此也就不存在着美德伦理学意义上具有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品格,品格是以“碎片”(fragmentation)的形式存在的。

与美德伦理学美德的三个基本论点相反,多里斯进而提出了情境主义的三个基本论点:(1)人们行为上的差异更多地归因于情境差异,而不是人们之间倾向上的差异。个体之间倾向上的差异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在某一特定的情境中,绝大多数人的行为都是趋同的。(2)经验证据表明品格归因是有问题的。在不同性质的情境中,被我们视为具有某种品格特征的人的行为通常表现出不连贯性。但这并不是否认行为可能具有暂时的稳定性,情境主义者承认,在一系列实质上相同的情境中,个体的行为可以表现出一致性。(3)人格结构在评价上通常是不一致的,或者说各种在评价上不一致的倾向共存于同一人格中。对既定的某个人来说,他在某一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倾向与在其他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倾向可能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3](P507)}

^① 行为的连贯性有两种:其一,行动者在所有相同性质的情境下总是采取相同的行为模式,其二,行动者在各种不同性质的情境下也能采取相同的行为模式。前者对应的是相同情境中的连贯性,后者则是跨情境的连贯性,多里斯承认人们的行为具有前一种连贯性,而否认人们的行为具有后一种连贯性。

多里斯的观点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他只是表明美德伦理学在品格学说上存在问题,需要用经验心理学来进行修正。他否定的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品格特征,但他并不否认我们可以观察到行为的规律性或一致性。他认为,“归根到底,问题是我们所观察到的行为的一致性应当首要地通过稳固的倾向结构还是情境的规则性来解释。情境主义者……偏向于用后者来解释”。^{[3](P508)}因此,实际上他肯定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某种品格特征,也肯定了这种品格特征对行为的影响作用,只不过这种品格特征是非常狭窄与脆弱的,它要受情境的决定,它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意义上的品格特征,后者要普遍和强势得多,而且可以免受情境的影响和决定。相比之下,哈曼的观点则更激进一些,他否认任何品格特征的存在。

二、强硬的情境主义观点

哈曼在《道德哲学遇上社会心理学》中首先以日常物理直觉经常犯错误为比方,来说明我们关于道德品格的日常直觉是错误的。他说,一般人通常会料想一个从飞机上掉下的物体将垂直地落下来,而实际上它将沿着飞机运动的方向作抛物线运动而落下来。因此,投弹手需要通过训练来克服其物理直觉。同样,日常道德直觉也存在这种不足。日常道德往往将人们的行为归因于品格特征,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误导。日常思维在描述和解释一个特殊的行为时,趋向于假设一个与之对应的行为者所特有的特征,还趋向于忽视行为者所感知的情境细节。因此,日常道德很容易犯罗斯(L. Ross)所说的“基本归因错误”。^①用来考察人们的不同行为方式是否反映他们具有不同的品格特征的经验研究得出了否定的结论。所以品格特征的存在不具有经验基础,人们关于品格特征的日常信念不过是一种幻象^{[5](P316)}。

接着,哈曼通过简单的分析认为,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概念就是对这种日常品格特征的描述。品格特征是以特有的方式而行动的长期稳定的倾向。

诚实的人倾向于诚实地行动,仁慈的人倾向于仁慈地行动。我们通常假定,一个人的品格特征有助于解释这个人所做的事情,至少在有些事情上是这样。比如,诚实的人想方设法归还捡到的钱包,因为她是一个诚实的人;拿走钱物然后扔掉钱包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是不诚实的人。哈曼分析,这两个人以不同的方式行动,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她们具有不同的品格特征。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她所处的情境不同,而不是因为她们品格上的差异。要证明她们具有不同的品格,就要求她们必须是在相同的情境中对情境具有同等的认知能力的情况下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行动。

哈曼进一步对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基本思路作了概括。他认为,泰勒、赫斯特豪斯等哲学家的共同主张就是,对道德进行分析的起点最好是美德或品格概念,然后根据美德或品格概念来解释道德的其他方面,我们通过考虑一个具有良好品格的人在某一情境中如何行动,来确定一个人在这一情境中应当如何道德地行动。一个行为是道德上正确的,是因为它是行动者的良好品格产生的结果,一个行为是道德上错误的,是因为它是行动者坏品格产生的结果。哈曼指出,这种美德伦理学预设了,存在着相关种类的品格特征,人们在他们所具有的品格特征上存在差别,而且这些特征有助于解释人们在行为方式上的差异。但社会心理学的经验研究表明这种差别非常微小,因此,美德伦理学所说的品格特征是不存在的,而这一结果将直接导致美德伦理学的方法的彻底失败。

最后,哈曼总结说,我们为了解释他人的行为,非常自信地将某些品格特征归于这些人,但是我们的归因可能是不正确的。实际上没有证据表明人们具有不同的品格特征。实验表明,人们的不同只是他们所处情境的不同和他们对情境的感知的不同。因此,我们在解释行动者的不同行为方式时无需假设品格特征的存在,而我们之所以假设品格特征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只关注行为者而忽视了情境。哈曼在2003年的文章中分析了这种错误的根源,他说,一旦观察者将某一特征归于某人,那么他就

^① 所谓“基本归因错误”,哈曼解释说,比如,一个图书管理员帮老妇人把东西背过街道;一个接待员插队站到一个老人前面;一个水管工往妻子的钱包里多放了50美元。虽然没有要求你对这些特征作任何推断,但你往往会认为,图书管理员乐于助人,接待员粗鲁无礼,水管工慷慨大方。或许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可能是由情境造成的,我们趋向于自发地从行为推断出品格。心理学家称这种倾向为“一致性偏见”或者“基本归因错误”。这一偏见或错误按照对应的人格特征来解释行为,其错误是忽视了情境因素。(Gilbert Harman,2003,p. 89.)

强烈地趋向于继续将这一特征归于这个行为者,即使是在不具有证实性的证据前。心理学家将这一偏见称为“证实偏见”(confirmaton bias),这种偏见只注意到那些符合其假设的证据而忽视反对假设的证据。^{[6](P89)}这意味着,人们明显具有不同的品格特征这一论断并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证据充分。确实,某些人和其他人“明显”具有不同的品格特征或人格特征。但是我们之所以发现这一事实是明显的,是因为我们趋向于犯基本归因错误,而不管是否真的存在这些品格上的差异。哈曼对品格特征的这一攻击,“其潜台词就是道德品格观念是一个幻象,因而道德哲学最好是关注特殊情境中的解决问题的判断,而不要以为伦理学可以关注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好的品格。”^{[7](P239)}

多里斯与哈曼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品格特征的存在,相比之下,多里斯的论证更为细致,而哈曼的观点则更为强势一些。多里斯只否定了较强意义上的美德或品格特征概念(由之产生的行为具有跨情境的连贯性),而哈曼还否定了较弱意义上的美德或品格特征概念(由之产生的行为在在相同情境中具有连贯性)。由于他们都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概念理解为较强意义上的品格特征,因此他们都否定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概念。他们的否定取决于他们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品格特征的理解以及他们所使用的经验证据。从他们的文本上看,他们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品格概念不能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三、情境主义的经验证据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所引用的这些经验证据及其对这些证据的分析。多里斯与哈曼所共同使用的经验证据主要是社会心理学家们所进行的一些心理实验。本文选取其中较为典型的两个实验,来说明情境主义者的观点。

“服从权威的实验”。第一个实验是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lgram)称之为“服从权威”的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实验对象被授予这样一项任务,当学习者(他实际上是实验者的助手)对所提问题回答错误或者不回答时,就对他进行逐渐增强的电击(实际上并没有产生真正的电击,但实验对象并不知情)。电击强度从 15 伏开始,并以 15 伏为单位逐渐增加,直至最高强度 450 伏。当强度达到 300 伏时,学习者开始猛烈撞击房间的墙壁,而

不再回答问题。强度达到 315 伏时,同样如此。在更高强度时,学习者不再产生任何反应。当实验对象征求实验者的建议或者表示他不想继续下去的时候,实验者会告诉他:(1)“请继续”或者“接着干”。(2)“实验要求你继续下去”。(3)“你绝对必须继续”。(4)“你没有其他选择,你必须继续”。如果实验对象被告知这四种回答后,他仍然要求停止,对他的实验就结束了。实验结果是,40 个实验对象中,5 个达到了 300 伏,这个强度被表明是“极剧电击”,学习者在这个强度开始猛烈撞击墙壁。5 个达到了 315 伏,学习者在这个强度再次撞击墙壁。2 个达到了 330 伏,这个时候学习者没有了任何反应。1 个达到了 345 伏,1 个达到了 360 伏。其余 26 个实验对象,即总数的 65%,达到了 450 伏。也就是说,这 40 个实验对象中的大多数都持续到底,对学习者进行了最高强度的电击。^{[5](P321-322)}

这一实验是在二战之后进行的,其目的是要解释对数百万人实行种族灭绝的德国士兵的行为。设计这些实验是为了测试出,服从命令这样一个理由是否具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大多数人是否会听从道德的命令或不道德的命令。这是因为在纽伦堡审讯期间,人们通常认为服从命令不能成为犯下这种反人类罪行的理由。德国之外的欧洲人认为,如果他们和德国士兵处于相同的情境,他们将抵制那些命令而不会做出罪恶的不道德行为。然而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结果非常令人吃惊:绝大多数人都会像德国士兵一样服从命令,对他人施予巨大的痛苦。概括地说,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用来检验这样一个假设:即使面临着不可抗拒的命令的压力,大多数人将保持同情心而拒绝残忍。然而实验结果却是大多数人都服从命令。^{[5](P322)}

哈曼指出,实验者曾预料只有极少数实验对象执行的电击能够超过“强电击”(150 伏),但我们可以看到实验结果是所有实验对象执行的电击都超过了这一强度,实验者们都没有料到这种结果。那些被告知了实验细节的人,大多都非常自信地认为,如果他们参加这个实验,他们会在 150 伏就停止,这要远远低于实际实验中所有试验对象所达到的强度。哈曼这样分析的意图似乎是想表明,我们假设品格特征的存在是一个错误,因为如果存在品格特征的话,实验结果就应当如试验者先前预料的一样。哈曼进一步分析说,65%的实验对象实施了 450 伏的电击,这个强度已经超过了“危险电击”,

在这个强度之前,学习者已经没有任何反应了,因此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些实验对象的人格存在问题,从而将实验对象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的品格缺陷,而不是具体的情境。然而,哈曼指出,我们不能通过试验数据(65%的实验对象实施了450伏的电击)来推断大多数人的品格都是有严重缺陷的。如果这样推断,那么所有的实验对象都至少达到了300伏的强度这一事实将意味着所有人的品格都有问题。因此哈曼认为,我们不能将实验对象的行为归因于他们的品格,我们应当用其他的因素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哈曼这样分析的逻辑似乎是:如果我们假定存在着品格特征,并用它来解释我们的道德行为,而实验数据表明所有人都不具备好的品格,那么这种假设就是毫无意义的。

“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实验”。第二个实验源于“善良的撒玛利亚人”的寓言。这个寓言大致如下:

……那人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故意问耶稣说:“我的邻居是谁呢?”耶稣回答说,“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在半道上落到了强盗手里。强盗们剥光了他的衣服打他,然后丢下奄奄一息的他离开了。这时一个祭司碰巧从路旁经过。祭司看到了这个人,从路边走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也从这里经过,看到他时也从路边走了(利未人是宗教仪式的重要参与者)。但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经过此地,看见他快不行了,就动了恻隐之心,走上来用油和酒洗净他的伤口,撕下自己的干净衣服给他包扎好,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护送他住到店里,并照顾他。第二天,撒玛利亚人又拿来两个银币,交给店主说,‘你暂且照应他一下,用多少钱,我回来时还给你。’你想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这个遇难之人的邻居呢?”他说,“当然是那个怜悯他的人”。耶稣对他说,“就照这个样子去做吧。”^①

这个寓言的标准解释关注的是寓言中的撒玛利亚人,是这个行动者的宗教或道德品格的类型,这一寓言向我们暗示,这三个人在信仰或者道德类型上存在差别。然而情境主义的心理学家则有不同的解释,达利(J. M. Darley)和巴特森(C. D. Batson)认为,人们可以想象祭司和利未人同撒玛利亚人在所处情境上的各种差别。比如,祭司和利未人可能正在专心思考他们的宗教事务,而撒玛利亚人则很可能没有;祭司和利未人可能正匆匆赶路

赴约,而撒玛利亚人则可能不那么匆忙。

达利与巴特森从情境主义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考察行为的差异究竟是由何种差别导致的,设计了一个实验。实验对象是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生。每个学生到达的时候都被告知,他将在另一幢楼中作一个演讲,并将对他的演讲进行录音。在前往演讲去的途中,实验对象碰见一个人(实验助手)摔倒在门口(表现得像心脏病发作的样子)。实验对象在何种情况下将停下来帮助这个摔倒的人呢?

50%的实验对象的演讲主题被指定为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寓言;另外50%实验对象的演讲则被指定为其他主题。有些实验对象被告知,他们快要迟到了,必须抓紧时间赶到演讲地。有些被告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还有一些则被告知他们要提前到达。通过这些实验对象对问卷调查的回答,可以判断出他们所具有的不同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取向。

实验结果显示,63%的不匆忙的实验对象停下来帮助摔倒者。45%的中度匆忙的实验对象停下来帮助摔倒者。极为匆忙的实验对象中的10%停下来帮助摔倒者。实验结果表明实验对象是否提供帮助与发言的主题没有关系,与宗教信仰也没有关系。上述变量中唯一一个导致行为差别的就是实验对象的匆忙程度。^{[5](P324)}情境主义者认为,对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寓言的标准解释忽视了情境因素,在这个实验中则忽视了不同实验对象的匆忙程度,因而犯了基本归因错误。

本文描述了伦理学中情境主义的主要观点和主要的经验证据,并未作进一步的评论和分析。实际上,情境主义者的观点、证据与它们对这些论据的分析,以及他们对美德伦理学的美德概念的理解都存在问题,不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不是本文目的。

参考文献:

- [1] Robert Adams. A theory of virtue: Excellence in Being for the Good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 Gopal Sreenivasan. Character and Consistency: Still More Errors[J]. Mind 117(2008).
- [3] John Doris. Persons, Situations, and Virtue Ethics [M]. Nous 32(1998).

^① 这一寓言是《圣经·新约》中的故事。译文参考了张久宣编:《圣经故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561-562页。

- [4] John Doris. *Lack of Character: Personality and Moral Behaviour*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5] Gilbert Harman. *Moral Philosophy Meets Social Psychology: Virtue Ethics and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J].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99 (1999).
- [6] Gilbert Harman. *No Character or Personality*[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13 (2003).
- [7] Joel Kupperman.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Character*[J]. *Philosophy* 76 (2001).
- (责任编辑:彭介忠)

Virtue as Illusion: the Basic Viewpoints of Situationalism and Its Evidences

ZHAO Yong-gang¹, HU Yi-yun²

(1. *Research Institution of Philosophy,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2.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36,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findings from social psychology, situationalists have denied the substantiality of the conception of virtue in virtue ethics to varied degrees. Doris just denies the substantiality of the conception of virtue in stronger sense. While Harman denies that in weak sense also. The main evidences come from the findings of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Key words: situationalism; virtue; Harman; Doris;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上接第 38 页)

- [18] Allen, Wood. *Karl Marx*[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 [19] Josoph Ratner.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28.
- [20] Ludwig Wittgenstein. *Culture and Value*[M]. Basil Blackwell, 1980.
- [21]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M].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8.
- (责任编辑:彭介忠)

Critique on Moral Dualism in Marx's Ontology

LUO Qiu-li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 Hanshan Teacher's College, Chaozhou, Guangdong 521041, China)

Abstract: Moral dualism has clarifie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initial moral-consciousness which has also offered its interpretation to our moral life. However, the fierce conflict between individual virtue and social morality in western society shows the predicament of moral dualism. The main defect of moral dualism lies in its metaphysical base. With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Marx found his morals in sense of ontology, which not only finds a critique on moral dualism, but offers some great inspirations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oday's western moral philosophy as well.

Key words: Marx; ontology; moral dualism; critique